

梁碧如—— 二十世纪初期 槟城华人社会的领袖

黄贤强

梁碧如(1857-1912),字廷芳,又名梁辉,广东省嘉应州梅县的客家人。1876年由中国南来槟城谋生,半年后移居马来半岛的吡叻州怡保。他曾担任过书记,不久后开设广嘉兴号,种植咖啡。梁碧如后来以采矿致富,并以“咖啡山锡矿家”名闻南洋一带。1895年受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吡叻州议政局议员。1900年亲赴欧洲游历,考察矿务,并顺道购置新式采矿机。不久,受委任为中国满清政府驻槟城第四任副领事(但习惯上简称领事,是中国政府驻槟城唯一的外交官),负责照顾槟城侨民。梁碧如于领事任期内向中国政府上《矿务刍言》,引论办理矿务之道,并阐述“中国大患莫于贫,救贫之道莫于办矿”。^①朝廷深加赏识,下旨将他的奏文刊登于商务官报,广为宣传,以供官民参考。除了关心国家政经大事外,梁碧如也

黄贤强博士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暨助理主任。

^① 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编,《槟城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79),页736。

关注教育事业。他曾出资在家乡创办蒙养学校，让儿童免费上学。梁对侨居檳城的教育慈善事业也不遗余力，先后捐助崇华学堂（时中学校的前身）和中华学校等巨款。^② 1912年4月梁逝世于檳城私邸。其子嗣为发扬父志，创办了璧如女校，^③ 作为纪念。

有关梁碧如的生平事迹，至今只知上述事略而已。其实，梁碧如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人物。从他担任副领事时的作为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与檳城华人的关系。而且，从他在官方任务以外的表现，也可以了解檳城副领事对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文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

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本文只能依靠当时和当地报章的零星报导为主，爬梳史料，重新建构梁碧如与檳城华人社会的这段历史。但要分析梁碧如在外交官任内的表现时，先要澄清他的任期和职衔。

外交官梁碧如：任期和职衔问题

梁碧如受满清政府委任为中国驻檳城的外交官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但一些材料和论著对他的任期和真正的职衔却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专家学者对梁碧如就职的年份有三种看法，即：1901年、1902年和1903年。对梁碧如的卸任时间则多认为是在1906年底或1907年初。而有关梁碧如的官衔也出现两种不同的称法，即副领事（或简称领事）或代理副领事。

研究新加坡和檳城领事制度的 John Chan Cheung 认为梁的任期是1901至1907年。^④ 研究檳城人文历史专家邝国祥认为梁碧如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出任檳榔嶼领事。”^⑤ 光绪27年即1902年。研究南洋史著名学者许

② 郑永美，〈先贤董事〉，檳城客属公会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编，《檳州客属公会金禧纪念暨时中学校八十校庆特刊》（檳城：檳州客属公会，1990），页197-8。

③ 梁碧如又称梁璧如，所以校名为璧如女校。

④ John Chan Cheu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s in Singapore and Penang, 1877-1911," *Semal Sejarah*, 9 (1970-71), p. 40n.

⑤ 邝国祥，《檳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页93。

云樵也认为梁碧如继任领事的时间是1902年，至1907年辞职返回祖国调查矿务。^⑥《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则注明梁碧如的任期是1903年1月到1906年12月，而职衔是“代副”，即代理副领事。^⑦

以上的说法都有不正确之处。由于没有发现梁碧如受委出任官职的公文档案，所以只能从其它资料来考证梁碧如的任期和职称。以下三则《槟城新报》的报道可以提供我们答案：

顷闻护理本坡中国领事梁君已接到前途来电言，实授本缺领事谢太守荣光定来月初三（即阳历12月13日）行旌，可返槟城云云。（1901年12月9日，〈本坡近事〉）

本坡中国领事谢梦池（即谢荣光）都转，于八月间乞假回籍，特为其封翁九秩开一寿辰舞彩称觞。现都转已于初四日行抵本屿回任视事矣。（1901年12月17日，〈近闻汇记〉）

闻护理本坡中国领事梁碧如司马现接家电，惊悉其太夫人仙逝。司马性孝，哀痛欲绝，乃立将所护理领事印交回谢都转接任，即拟本月中旬搭英公司轮船奔丧回籍云。（1901年12月17日，〈近闻汇记〉）

这三则新闻报道已清楚说明领事谢荣光曾于1901年9月（光绪27年8月）回去中国家乡为父亲祝寿，至1901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初四）才返抵槟城。谢荣光返国其间，领事一职由梁碧如“护理”，即代理也。因此可以断定梁碧如曾经在1901年担任代理领事，为期三个月左右。正巧在谢荣光回到槟城的时候，梁碧如突然接到其母逝世的恶讯，匆忙赶回祖籍奔丧。没有资料说明梁碧如何时返回槟城，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901年

⑥ 许云樵，〈星马设领始末考〉，《南洋文摘》1卷5期（1960），页18；《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有关梁碧如事略部份，也注明梁是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八月受委出任槟城领事，见页736。

⑦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3。

12月以后，谢荣光继续担任领事一职直至1903年1月。因为其间有多则有关槟城华人社会的新闻报道，都清楚的指明谢荣光领事参与其事，其中包括1902年3月设宴款待到访的两广委员吴质钦司马、同年5月协助筹办英皇加冕庆典、以及1902年11月筹賑厦门等地饥灾等活动。^⑧

谢荣光于1903年1月卸下领事一职，并推荐曾担任代理领事的梁碧如继承重任。这样的安排不只因为梁碧如有经验，而且也因为梁是谢荣光的女婿。^⑨因此槟城各界相信梁上任以后，必能萧规曹随，继续造福槟城华民。^⑩

由上述的讨论可以确定梁碧如的任期如下：

1901年9月至1901年12月：代理副领事

1903年1月至1906年12月：副领事

外交官梁碧如：任期内的表现

梁碧如正式接任副领事一职时，受到槟城各界的重视和肯定。当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国政府此项任命时，槟城的英国官员“乐为接待”。^⑪而且，当地报章对梁碧如的评语是：“南洋巨商，致富有术，才略亦优。今中国各正外交需才之时……想梁君必有一番新猷，以慰人望也。”^⑫由此可见华人社会对梁碧如的正面评价和期望。

要评估梁碧如任期内的表现，就要看这位槟城副领事有没有达成指定的外交任务，进而建立个人声望，以及有没有在华人社会中作出贡献。前

⑧ 《槟城新报》，1902年3月3日；5月16日；11月24日。

⑨ 谢和梁的另外一层重要关系是两人都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见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亚洲文化》21（1997），页187-188。

⑩ 《槟城新报》，1903年2月10日。

⑪ 《槟城新报》，1903年2月10日。

⑫ 《槟城新报》，1903年2月10日。

者是官方的职责，后者则是非官方任务。

檳城副领事的第一个官方任务是照顾和保护华商和华民。中国驻英国公使薛福成于 1890 年奏请在檳城等地设置副领事时提到：“华商因受欺凌剥削，无不环诉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盖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⑬但梁碧如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空间可发挥，因为檳城与其他南洋商埠不同，华人社会内部的组织力相当强。从 1800 年广福宫创建以来，广福宫的领导层（主要是由闽、粤两帮的富商组成）便负起照顾华民和协调华人纠纷的任务。^⑭到了 1881 年平章公馆成立后，华人社会的组织更严密，而且也更分工。基本上广福宫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宗教和慈善事务上，而平章公馆（其组织架构也类似广福宫，是由闽、粤两帮富商担任总理和协理的职务）的负责人则在日常华人事务上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包括协调和解决华人之间的纠纷。^⑮1890 年 3 月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檳城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委任广、福、客、潮四帮的富商共十七人为委员，^⑯代表华社将民意反映给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福利。同时，华人委员也负责将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传达给全体华人，使华人与英政府有直接沟通的管道。1903 年 6 月檳城华商

⑬ 薛福成，〈使英薛福成奏英属各埠拟添设领事保护华民摺〉，《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影印本），卷 83，页 33-36。

⑭ 有关广福宫的创建和其在当地社会的角色，见陈剑虹，〈檳榔屿广福宫史话〉，广福宫纪念特刊编委会编，《檳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 188 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檳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页 34-36。

⑮ 有关平章公馆的创建和其在当地社会的角色，见陈剑虹，〈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廓，1881-1974〉，檳州华人大大会堂特刊编委会编，《檳州华人大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暨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檳城：檳州华人大大会堂，1983），页 135-162。

⑯ 十七名委员为广帮的陈丽琴、周兴扬、陆炳时、梅福星；客帮的张韶光、谢双玉；潮帮的许武安、纪来发、陈江福；福帮的李振传、谢增煜、谢有义、邱心美、陈锦庆、陈心和、杨章柳和林花钻。见 General Notification No.187,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28 March 1890；陈剑虹，〈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廓，1881-1974〉，页 138。

也相当自发地成立槟城华人商务局，协调和解决华商所面对的问题。^⑰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槟城华人无论在宗教信仰上，日常事务上，与英国政府的交涉上，以及在商业利益上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槟城领事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梁碧如的第二个官方任务是接待来访的中国官员和过境的皇亲国戚。在这方面梁碧如表现得非常称职，每次都率同当地富商和侨领，殷勤的招待访客。在梁碧如代理及正式担任副领事其间，先后接待的访客和贵宾包括1901年过境的醇亲王，^⑱1904年来视察中华学校的赖焕文太史，^⑲以及1905年来鼓励华商回国投资的张振勋太守。^⑳以下举醇亲王的过境为例。醇亲王于1901年10月由德国返国途中短暂停留槟城。槟城副领事梁碧如随同专程赶来的新加坡总领事罗忠尧隆重接待。根据当地的《槟城新报》的报导：“中国驻屿(槟城)领事梁，驻叻(新加坡)领事罗即偕同屿中各绅商等数十人躬至码头恭迎。先由两领事恭诣船上请王驾登岸。”^㉑可是醇王因长途跋涉，身体不适，再加上天气欠佳，下着细雨，因此没有上岸。但他仍下令他的随员登岸，分别在平章公馆和梁领事府接受茶点款待。午后，随员们返回船上。罗忠尧总领事和梁碧如副领事也登船，亲自随护醇亲王一行人南下新加坡。报章还指出，虽然醇亲王本人没有亲自上岸，但槟城市区“各华人商户，无不张灯结彩，并悬挂中英两国旗，沿途锦片缤纷，甚形热闹。足为我中国人心振兴之象也。”^㉒由此可知醇亲王的过境，是华

^⑰ 有关槟城华人商会成立的背景和发展，见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1978），页75-87。

^⑱ 《槟城新报》，1901年10月25日。

^⑲ 《槟城新报》，1904年7月6日。

^⑳ 《槟城新报》，1905年3月9日。

^㉑ 《槟城新报》，1901年10月25日。

^㉒ 《槟城新报》，1901年10月25日。

人社会中的一件大事。而领导华商和華民迎接醇亲王的正是驻当地的中国领事。其实，檳城领事不只是一要款待中国官员，也要接待英国的贵宾，例如1907年2月梁碧如也曾率同当地侨领招待来访的英国皇族康乐公爵(Duke of Connaught)及其夫人和女儿。²³

檳城副领事的第三个官方任务是办理与清廷有关的庆典活动。每当清朝皇帝及太后华诞的时候，梁碧如要负责各种庆祝活动，包括广邀当地富商和侨领到领事府参加庆典和餐会，并借此机会向当地华人灌输爱国精神和效忠清廷的思想。习惯上，庆典会场上会摆设龙匾一座，作为满清皇权的象征。受邀的华商领袖，按官阶和身分地位的高低列队，行跪叩大礼。然后，由官位最高的一人朗读颂文以表效忠之诚。²⁴类似的贺庆活动梁碧如不敢怠慢，每次的庆典都办得有生有色。

梁碧如的第四个官方任务是劝檳城华人捐款救灾，尤其是中国各地发生了天灾所导致的饥荒时，梁碧如常以身作则，带头乐捐巨款。例如，在1903年捐賑广西灾饥的活动中，梁碧如捐款五百元，名列榜首。²⁵中国灾区的政府也常派专员来南洋劝请华侨捐款賑灾。而梁碧如也接待和协助这些专员，使募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综合以上所论，梁碧如在四项官方任务中，除了第一项比较少空间可发挥外，其他三项都表现得很称职。由于梁碧如在接待到访官员、筹办庆典、和筹款捐賑活动中扮演领导的角色，为他在华人社会中建立了个人声望。如果说梁碧如的官方任务为他树立了社会地位，他在非官方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则使他对檳城华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檳城华文教育和慈善事务上的贡献。

²³ 《檳城新报》，1907年2月20日；康乐公爵等人也曾停留新加坡并受到当地华人领袖的欢迎，见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410-412.

²⁴ 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领袖进阶模式的探讨（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5期（1993年12月），页80。

²⁵ 《檳城新报》，1903年7月14日。

教育家梁碧如

梁碧如对于槟城华文教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大力推动中华学堂的创办。中华学堂成立于1904年，是槟城第一所新式的华文学校。在1904年以前，槟城的华文教育属于传统的私塾或书塾，由富裕人家请老师在家中教授自己的孩子，或在宗乡会馆里教导同乡或同宗的子弟。学生所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四书》和信札作文等。老师是用方言来讲课和教学。早在1888年开办的南华义学，即是属于此类传统学塾。^{②6}

中华学堂的一个特点是以华语教学，以取代旧私塾和书塾所采用的方言，如此便能同时接受闽、粤、客、潮、琼等各籍贯的学生子弟，消除华人社会中因方言所带来的隔阂。用华语教学的背景和好处，在该学校的章程中有清楚的说明：

槟城闽、粤同居异语。闽则漳、泉殊音；粤则广、潮、客、琼不通，言情之难通，多由此故。且分地分音教之，但请教习须分请漳、泉、广、潮、客、琼六音之人，既不胜其繁，且多费数倍，而学成还国，亦属无用，或见国人无以通语……用官话（华语）为教授，凡入学堂之人，皆可通语而相亲，还国可通行而有用。二十年后全槟少年人人同语，无省府之分，岂不善乎。^{②7}

虽然预测二十年后槟城人人通用华语是过于乐观，但以华语教学，的确可以节省办学费用和有助于促进当地不同籍贯的华人相互沟通和团结。对那些以后想回去中国发展事业，或回去参加考试以求当官的人，趁早学习华语更是必要的。

中华学校有别于传统学塾的第二个特点是教学内容更多样化。其中包括“如何修身、如何体操、如何识字、如何造论、如何习国语、如何习西

②6 陈翼经〈槟州百年来的教育〉，《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暨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页399-400。

②7 《槟城新报》，1904年4月25日。

文、如何学算、如何学史、如何进而地理、图书、法律、政治”。^⑳因此，中华学堂的开办，可说是受到当时中国新式学堂的兴起的影响。^㉑新学堂的教育目的，不只是希望开启民智，也要激发学生的爱国心。

槟城各界对中华学校的创设与促进岛上华人合群和爱国之心，可以从一则论说文章中看出。在〈论创设南华学校〉一文中，作者提到南华学校（即中华学校）虽是少数几个人倡建，但却是成千上万各行各业华人的心愿，包括农人、工人、小贩；也包括老和少、男和女、贫和富者。学校的创设，可说是“文明之起点”。而且，“将来学成可以强国，可以强种，可以立于优胜劣败之场，无复如牛马奴隶。”^㉒由于中华学校负有如此崇高的任务，身为槟城副领事的梁碧如当然义不容辞，积极参与筹办。

1904年4月21日、23日和27日，槟城闽、粤绅商数十人在平章公馆开会三次，分别商讨筹办中华学堂的各项事宜。在第一次会议中，决定了中华学堂暂借平章公馆上课，等筹足建校经费后，才购地建校舍。^㉓第二次会议中则推选八十位绅商为筹办学校的总理人。梁碧如名列第三位，仅次于曾担任槟城第一任副领事的张弼士和锡矿业富商胡子春，可见梁碧如在筹办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㉔

在4月27日的第三次会议中，更详细分配80位总理人的筹办工作：张弼士和林克全（时任槟城华人商务局主席）两人为管银钱总理；梁碧如、林花钻、胡子春和谢德顺为学校干事总理；其它七十四人则为筹办经费总理。^㉕此次会议并决定捐款分为两种：创捐和长捐。创捐是指学校开办时所

^⑳ 《槟城新报》，1904年4月25日。

^㉑ 有关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式学堂的兴起，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页23-42。

^㉒ 《槟城新报》，1904年5月5日。

^㉓ 《槟城新报》，1904年5月10日。

^㉔ 《槟城新报》，1904年4月25日。

^㉕ 《槟城新报》，1904年4月28日。

需的经费，包括购买桌凳、教学用具、书籍、图书器材，以及人事费用和购地建校的基金；长捐则是指每年所需要的经常开支费用。^⑭领导创办的绅商以身作则，当场捐献款额如下：^⑮

捐款人	创捐(元)	年捐(元)
张弼士	5,000	500
梁碧如	5,000	500
胡子春	5,000	500
谢德顺	1,000	120
林克全	1,000	—
张耀轩	5,000	500
谢荣光	5,000	500
合计	27,000	2,620

由捐款数额可知，梁碧如是中华学校创办初期最慷慨的捐款人之一。

梁碧如与中华学校的密切关系，更具体表现在他受邀出席学校的开课庆典，并作开学演讲。中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课。^⑯开学典礼当天，学校总理数十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到场观礼，盛况空前。当地记者称之为：“诚开埠以来吾华人第一美事也。”^⑰由于梁碧如身兼主要的创办人和副领事，被奉为典庆上的首要贵宾。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开办中学堂的利益：“言其大可以救国，言其小可以致富，言乎私可以利己，言乎公可以达人。”

^⑭ 《槟城新报》，1904年5月11日。

^⑮ 《槟城新报》，1904年4月28日。

^⑯ 最早所开的班是速成夜学班，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九点上课，为期三个月，第一期学生有50余人。见《槟城新报》，1904年5月17日。

^⑰ 《槟城新报》，1904年5月17日。

更具体一点，梁认为办新式学堂对国家的好处包括培养爱国的人才。他举日本为例子：“闻日本兴学之初，大都以养成国民为主义。”而且，“此学堂之设，既能速成人才，又能输文明与祖国。”对中国的进步肯定有帮助。对个人的好处，包括可以回国考取功名、大富大贵、光宗耀祖。因为槟城副领事有权力推荐海外侨民回国参加考试，及格者则听候封官录用。可惜在中华学校开办以前，“此间熟于英文、英例、商法、政治、医学者，颇不乏人，皆以未通华文正音之故，不愿归国。有此学堂则已通西学者，不数年，必中西兼邃，得科目，得禄位，扬名显亲。”所以，在总结他的演说时，梁碧如诚恳的“敬告学生，奋勉向学，冀成大器以报国家。以进文明，以光前烈，以模后进。”³⁸可见梁碧如一边推动槟城的华文教育，一边培养报效祖国的人才。正符合他作为教育家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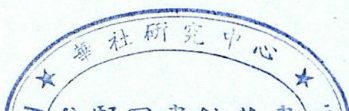
中华学校开办以后，梁碧如继续关注学校的发展。由于上课地点暂借用平章会馆，对教学方面相当不方便。梁领事便积极寻找一地点作为学务处，作为学校行政中心和老师的交谊中心。此后，各总理可定期（每月初一和十五）在学务处开会。梁碧如也鼓励各总理将家里珍藏的书籍置放在学务处，以便学生和老师参阅。同时，老师可随时到学务处与同事交换教学心得，改进教法。³⁹可见，梁碧如不只出钱出力，而且尽力改善学校各方面的设备，使中华学校栽培了不少有识之士，在槟城华文教育史上占了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梁碧如对教育的贡献并不只限于华文学校。1906年10月在一次英文义学堂的捐款活动中，共获得43名各种族人士（包括马来人和印度人）及公司的捐助，总共筹得5,770元正。梁碧如慷慨捐出了500元正，与张弼士、胡子春、林妈栽、邱氏公司和谢氏公司同列榜首。梁碧如等六人和公司，便合捐了3,000元，占总捐款数一半以上，可说是非常热心。⁴⁰

³⁸ 《槟城新报》，1904年5月16日。

³⁹ 《槟城新报》，1904年5月27日；6月10日。

⁴⁰ 《槟城新报》，1906年10月22日。



1907年7月，另一所英校，即圣芳济书院，也因要扩建校舍而募捐。梁碧如再次慷慨解囊，捐银1,000元，在善士芳名榜中排名第二。④

除了创办和重建学校外，梁碧如对贫穷但有志向学的各族子弟也给予帮助。当新马各界绅商为感谢前任七州府（包括海峡殖民地三州和马来联邦四州）华民政务司奚尔智逝世前对华民的照顾，特别筹设一个以他命名的奖助学基金，以协助七州府内各学校中的贫穷学生交学费。梁碧如捐出200元，比当时新马一些知名的富商和领袖还慷慨。例如张弼士、吴寿珍、陈若锦和林克全等仅各捐100元，黄亚福和余连城等也只各捐50元而已。⑤

当梁碧如卸下领事一职后，仍继续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1908年槟城另外一间华文学校——崇华学校（1912年以后校名改为时中学校）创办时，梁碧如也出钱出力。他捐助100元作为开办经费，仅次于各捐200元的戴欣然、胡子春、谢荣光和万裕兴号。⑥更为人称道的是在1912年，由梁碧如、谢荣光和戴欣然三人各捐一万元购置五间店铺，并将它们出租，所得租金充作时中学校的常经费，根本解决了这所学校的财政困境。⑦

梁碧如对教育的热心和贡献，在他逝世后，仍为人所乐道。当梁碧如于1912年逝世时，遗嘱注明要拨十万元遗产赞助教育慈善事业。⑧他的子嗣依照遗嘱办理，拨付巨款予中华学校和时中学校。同时，为了发扬父志，创办一间以父名为校名的女校，即璧如女校，以弘扬其父生前主张教育不分男女，应一视同仁的开明思想。璧如女校也是槟城最早的女子华文学校

④ 陆秋泰捐银5,000元，名列榜首。除了梁碧如外，另有三人同样各捐1,000元正。他们是颜五美、林克全和陈江福。见《槟城新报》，1907年7月26日。

⑤ 《槟城新报》，1906年11月1日。

⑥ 《槟城新报》，1908年5月13日。

⑦ 李书城，〈槟城时中学校沿革概略〉，《槟城客属公会金禧纪念暨时中学校八十校庆特刊》，页196。

⑧ 《梁碧如先生事略》，《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页736。

之一。^{④⑥}

慈善家梁碧如

梁碧如除了极力支持教育事业外，也参与其他慈善活动，包括对宗教庙宇、医院和赈灾的筹款活动。早在他担任槟城副领事之前，梁碧如便曾捐款 2,000 元，作为修建极乐寺之用。^{④⑦} 1902 年 12 月梁碧如响应新加坡总领事凤仪的号召，捐款 500 元协助祖国创办北京医局。^{④⑧} 梁担任槟城副领事后，对槟城境内的医院也特别照顾，曾捐赠贫病医院 100 元，作为购置棺木费用，使贫老病死者有棺木得以安葬，入土为安。^{④⑨} 1908 年，梁碧如的故乡广东省嘉应州传来恶讯，谓家乡地区鼠疫流行，入春以来因这种传染病而导致死亡者已超过 500 多人。由于事态严重，急需南洋亲友筹款购买捕鼠器以及预防和治疗的药物等。梁碧如与另外 21 人联名在报纸上公开劝捐，为善不落人后。^{⑤①} 1903 年广西因天灾导致饥荒，槟城华人基于同情祖国同胞，发动多次的捐赈活动。在其中的一次捐题中，梁碧如捐款 500 元，名列榜首。^{⑤②} 1908 年广东八邑水灾为患，生命和财产损失惨重，灾后饥荒严重，槟城各界又一次捐款救济，在其中一次捐款芳名录中，总共有 67 人题

④⑥ 槟城第一间女校是中华女学校，创办于 1908 年 2 月 21 日。根据当地报章的报导，“本埠中华女学校经于前一月教授学生，礼仪于本月二十日（即 2 月 21 日）十二点钟开幕。是日设大茶会，来宾莅会者数百人。”见《槟城新报》，1908 年 2 月 22 日。因此，郑良树教授认为槟城中华女校于 1916 年创设，应该有误。见郑著《新马华社早期的女子教育》，《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 期（1997），页 53。

④⑦ 陈铁凡和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页 652。

④⑧ 《叻报》，1903 年 3 月 7 日。

④⑨ 《槟城新报》，1904 年 7 月 9 日。

⑤① 《槟城新报》，1908 年 5 月 22 日。

⑤② 《槟城新报》，1903 年 7 月 14 日。

捐，梁碧如以捐银 100 元，名列榜上第五位。而排在前四名的捐款者都是商号或社团，他们分别是广货行捐 1,000 元，广东暨汀州会馆捐 800 元，罗茂生捐 200 元，以及广源号捐 120 元。^⑤

梁碧如对慈善和公益的热心，常为槟城各界人士所赞颂。槟城商务学堂便曾以“梁碧如之热心公益”作为作文题目，让学生比赛写作，其中一名得奖者林润芝便以写实且带感性的手法提到：中国各地常发生自然灾害，“同胞流离失所者，百万有奇矣。”作者继续写道，中国目前的情景，可说是遍野哀景，遍地哀情，老弱妇孺正在垂死边缘，急需救济。但有许多伪君子 and 伪善者敷衍了事，不肯出力捐输赈济。“今何幸而有前槟榔屿领事官梁君碧如之热心公益者。梁君何人也，是亦旅外之华侨耳。举笔一挥，立捐巨万，其勇于为善之心，盖可见然。”^⑥作者之所以得奖，其中的一个因素是他将梁碧如的善行直接道出，获得评审员的认同。另外一名得奖同学在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应仿效梁碧如的善行，共襄盛举：“本埠殷商不仅有梁君也，吾同胞之敬之、爱之、仰望之、亦不独一梁君也。岂热心救国、救种、解荷囊而济灾民者独让梁君专美于前耶。当仁不让，具有大愿力者想必自有权术矣。吾当拭目俟之。”^⑦

结语

二十世纪初期槟城的华人社会比十九世纪更复杂。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积极的扩张他们在槟城的影响力。梁碧如不负满清政府的付托，在他担任槟城副领事的任期内，尽力完成官方的职责，可说是一位称职的外交官。梁碧如周详的接待到访或过境的官员和皇族。在筹办庆典活动时，他也尽力动员侨领和华民参与其盛，同时趁机宣扬爱国主义和效忠清廷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在推动赈灾筹款活动时，

^⑤ 《槟城新报》，1908 年 11 月 3 日。

^⑥ 《槟城新报》，1908 年 7 月 7 日。

^⑦ 《槟城新报》，1908 年 7 月 8 日。

得到爱同胞和爱国的槟城华人的热烈支持。但梁碧如更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对槟城华文教育的贡献和对慈善事业的热心。梁碧如为中华学校和崇华学校出钱出力，留名青史。他的遗嘱中注明拨巨款捐助学校，也成为佳话。每当中国等地发生天灾和饥荒时，梁碧如往往率先捐赈，为善不落人后。

梁碧如身兼外交官、教育家和慈善家，众望所归，自然成为槟城华人社会的领袖之一。由于槟城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从十九世纪初期以来便被福建和广府两帮所垄断。而梁碧如是客家人，却能成功挤入槟城的领导阶层。因此，了解梁碧如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与槟城华人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评论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结构和特点。但这个重要且复杂的课题，需留待另外的专文讨论。

附录

檳城中华学校开课当天领事官梁碧如的讲义全文*

今日中国如此危机，非培植人才，断不足以救中国。中国人民除南洋英属得以往来自便外，若美国各埠、若坎乃大、若檀香山、若澳大利亚则已下逐客之令；若古巴、若秘鲁、若夏湾拿各埠则苛例日增；若安南、若欧罗巴、三宝瓏、泗里华、日里、阿齐各埠，则必纳身税。以中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富、矿地之多、例禁之宽，外国人日夜图谋，趋之如鹜者。中国人反自甘弃置，别父母，离妻子，不远万里，或受雇于洋人，或掷资本于苛例繁兴之地，一若不知自己有无尽之宝藏，莫大之利源者。岂真舍己芸人哉，实以无人才之故。不知如何分验、如何制器、如何销售、不能不弃之如遗，听外人之予取予求，谓与我无相关涉耳。然则欲培植人才，舍设立学堂其曷？

由乎今日檳城中华学堂之设，言其大可以救国，言其小可以致富，言乎私可以利己，言乎公可以达人。谅诸君具有卓识，必已熟筹而洞悉矣。鄙人所最欣幸为诸公预贺者，厥有数端焉。鄙人不敏，忝任檳领。比年以来，叠奉出使英国大臣，遵旨札查出洋华商子弟在外国学校肄习专门之学者，咨送回华考试，赏以科目，听候录用。此间熟于英文、英例、商法、政治、医学者，颇不乏人，皆以未通华文正音之故，不愿归国。有此学堂则已通西学者，不数年，必中西兼邃，得科目，得禄位，扬名显亲，定操左券矣，可为欣幸者一。

此间华人数十万，举其多数，动曰闽粤。其实籍隶闽省者有福州、漳州、泉州、汀州土音之不同。籍隶粤省者有广州、潮州、惠州、琼州、嘉应州土音之不同。若江西、广西等省人之居其少数者无论矣。本省人与本省人不通语，本府人与本府人不通语，虽比邻莫问姓名。遇事故，多赖传

* 录自《檳城新报》，1904年5月16日。原文无标点和分段。此处之标点和分段是作者所加。

译，是以其情揆，其谊疏，精神隔膜，意气不投，议论难融，交臂相失。虽欲合群，何从而合之。有此学堂，以教官话，则此后无含意求伸之苦，无对面不识之人。相亲相爱，相应相求，龃龉之事可免，畛域之见无分矣，可为欣幸者二。

中国各省自奉旨设立学堂之后，所有教法逐渐改良。伏查钦定学堂章程，每日课授修身经史等学外，必以一时兼习外国文字，询诸曾在学堂肄业之人，则谓凡习外国文者，独以肄习英文为多。惟学堂设在内地，均不免有一齐人傅，众楚人咻之苦耳，是以极少精通西文者。今此间肄习英文已有义学，况置庄狱之间，又得极善教法，但能溥通中学，即可以彼此翻译，他日书成，定多善本。是此学堂之设，既能速成人才，又能输文明与祖国也，可为欣幸者三。

各国商务、矿务、作育人才，虽赖学堂，引其端绪。迨夫身经阅历，叙述所得，往往蔚为著作，以资考求，故其书愈出而愈精，其法愈积而愈善，华人经商开矿恒有独出心裁，可以传为楷范，有裨公益者，祇以华文未甚淹通之故。虽父兄之于子弟不能尽接心，传他何论哉！不知者以为秘不欲宣也，窃以为良田笔不能达耳。此学堂立，吾知将来华人必有博采信而有微之言，垂简编以贶后进于无穷者，可为欣幸者四。

鄙人未经学堂陶冶，不知教育之道，闻日本兴学之初，大都以养成国民为主义。今学堂课程皆以修身居首，厥为此也。此属教习义务，想诸教习恭酌尽善，必能恪遵定章，纳学生于典，则不仅以语言文字为起点，以天地、化算、声光、汽电等学为归宿也。敬告诸君，各抒伟论，互为正是，以求至当。敬告教习，化其见成，广求新法，乐育英材。敬告学生，奋勉向学，冀成大器以报国家，以进文明，以光前烈，以模后进，则学堂有光，总理有光，凡我华人莫不有光矣。鄙人不文，粗陈梗概，尚望各总理，各教习，凡有德行道义者，不憚苦口危言，随时演说，孰几收效尤速也。诸君！诸君！然乎？否乎？